
《左傳》中「博物君子」*的古史修養

孫玲玲

北京大學中文系

春秋時期講史活動盛行，其中以子產等「博物君子」為代表的講史行為尤其引人矚目。他們雖非史官，但是對祀譜、帝系等古史知識十分熟悉，究其原因主要有二：一、西周以來禮樂之教中涉及帝系、古史知識的內容，是他們獲得古史知識的重要基石；二、春秋時期，隨著史官文獻的進一步下移，博物君子得以通過閱讀此類文獻、「觀樂」、「觀書」、「問學」等多種方式習得古史知識。掌握了這些知識的博物君子們又結合時代之需將其與「德政」、「禮政」相結合，成為他們表達政見、掌控話語權的有力工具。

關鍵詞：博物君子 古史知識 禮樂之教

《左傳》中「博物君子」的古史修養

1

* 本文所說的「博物君子」指的是春秋時期以子產等為代表的貴族知識分子。

春秋時期是一個歷史意識勃興的時代，¹ 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講史活動的盛行，² 誠如葛兆光先生所言：「當時人對於秩序的理性依據及價值本原的追問，常常追溯到歷史，這使人們形成了一種回首歷史，向傳統追尋的習慣。」³ 正是在這樣一種追溯歷史的時代潮流下，不獨史官，其他身份的人也都積極參與到講史活動之中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以卿大夫等貴族精英為代表的講史行為。如昭公元年（前 541）為晉侯診疾的鄭國大夫子產，文公十八年（前 609）對高陽、高辛、帝鴻、少暉氏等古史如數家珍的魯國大夫季文子，襄公四年（前 569）將羿浞代夏、少康中興等故事娓娓道來的魏莊子，襄公二十四年（前 549）談及「死而不朽」時而詳細講述其家族歷史的范宣子，以及昭公十七年（前 525）對其祖先少暉氏以鳥名官的掌故瞭若指掌的郟子等等。這些人物皆非史官，但他們對古史知識的熟知程度卻毫不遜色，有的甚至比史官的知識儲備還要豐富。⁴ 如果說史官的古史知識來自於其職守的話，那麼這些「博物君子」的古史知識又源自何處？他們對古史的態度和運用相較於史官又有何不同？這些關涉春秋時期士人歷史知識來源的問題目前還缺乏系統研究，故筆者不揣冒昧，試論一二，以就教於方家。

- 1 柳詒徵先生在《國史要義·史原》中有言：「由贊治而有官書，由官書而有國史。視他國之史起於詩人學者，得之傳聞，述其軼事者不同。」「史官掌全國乃至累世相傳之政書，故後世之史，皆述一代全國之政事，而尤有一中心主幹，為史法、史例所出，即禮是也。」由此可見，中國之歷史意識由來已久。然較之前，春秋時期歷史意識的一大亮點乃在於「博物君子」講史活動的興盛。柳詒徵：《國史要義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2、9。
- 2 關於春秋時期的講史行為，李小樹：〈先秦兩漢講史活動初探〉（《貴州社會科學》1998年第2期，頁98-103）一文是筆者見到的較早關注此問題的學術論文。此後，關注此話題的論文逐漸增多，較有代表性的如王旭送：〈春秋時期的重史傳統〉（《沙洋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》2005年第6期，頁10-13）一文將春秋時期的講史活動分為「政治性講史」、「知識性講史」、「生活性講史」三類。王大雙：〈淺析春秋時期的講史活動〉（吉林：吉林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，2007年）、楊詩詒：〈《左傳》中貴族講史現象初探〉（吉林：吉林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，2013年）兩篇碩士論文對這一時期的講史活動也有相關論述。
- 3 葛兆光：《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、思想與信仰的世界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169。
- 4 如叔向之所以要向子產請教關於「實沈」、「臺駘」二神的來歷，就是因為晉國史官「莫之知」。見楊伯峻：《春秋左傳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），頁1217。